

# 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

安志敏

文物出版社

23

38

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十八号

# 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

安志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

封面题签 夏 鼐  
封面设计 金国辉  
责任编辑 孙关根

**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

安志敏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2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17.5 插页：13

统一书号：11068·1089 定价：3.90元

# 目 次

✓ 一、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 1 )
二、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	( 20 )
三、裴李岗、磁山和仰韶	
——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	( 33 )
四、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	( 48 )
五、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	( 58 )
六、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 69 )
七、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 80 )
八、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	( 89 )
九、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	
——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	( 101 )
十、庙底沟与三里桥的文化性质及年代·····	( 130 )
十一、略论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打制石器·····	( 147 )
十二、沙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	( 154 )
十三、殷墟之石刀·····	( 163 )
十四、中国古代的石刀·····	( 172 )
十五、古代的糙面陶具·····	( 195 )
十六、“干兰”式建筑的考古研究·····	( 204 )
十七、略论甘肃东乡自治县唐汪川的陶器·····	( 224 )
十八、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	( 233 )
十九、郑州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	
——兼论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	( 249 )
✓ 二十、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	( 256 )
编后记·····	( 272 )

# 图版目次

彩色图版 1. 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的齐家文化铜器

2. 《西清古鉴》的铜鬲

- 图版壹 海拉尔的细石器  
图版贰 海拉尔的细石器与晚期陶片  
图版叁 两侧带缺口的石刀  
图版肆 长方形石刀  
图版伍 长方形石刀  
图版陆 半月形石刀  
图版柒 镰形石刀和有柄石刀  
图版捌 蚌刀、蚌镰和陶刀  
图版玖 古代和现代的铁制品  
图版拾 古代的糙面陶具  
图版拾壹 古代的糙面陶具  
图版拾贰 石寨山铜制“干兰”式建筑模型  
图版拾叁 石寨山铜制“干兰”式建筑模型  
图版拾肆 石寨山铜制“干兰”式建筑模型  
图版拾伍 石寨山铜制“干兰”式建筑模型  
图版拾陆 江西清江营盘里出土的陶屋模型  
图版拾柒 “干兰”式建筑遗迹  
图版拾捌 “干兰”式建筑遗迹  
图版拾玖 “唐汪式”陶器  
图版贰拾 “唐汪式”陶器  
图版贰壹 “唐汪式”陶器和骨镞  
图版贰贰 辛店文化乙组陶器  
图版贰叁 早期铜器及存疑的器物  
图版贰肆 几种作物的灰象

# 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 一 引 言

建国以来的新中国考古学，同其它学科一样，是飞跃发展的三十年，是茁壮成长的三十年。特别是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属于新兴的学科之一。解放以前的三十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发展缓慢，基础薄弱。建国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考古学也完全呈现了崭新的面貌，从调查发掘到科学研究，队伍之壮大，收获之丰富，成果之显著，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罕与伦比。作为考古学一部分的新石器时代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解放以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不过二三百处，而经过正式发掘的更是寥寥无几。经三十年之积累，不过是在黄河流域发现“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虽然初步了解它们的大体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但始终作为两个不相干的文化系统。从东北、内蒙古到新疆的北方草原地带，以细石器和篦纹陶为代表的遗存，被作为一个文化系统而称之为“细石器文化”；至于长城附近与彩陶、磨制石器共存的，则被视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东南沿海一带，凡以几何印纹陶和磨制石器为代表的遗存，都被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以上三者构成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体，至于其它地区的零星发现，尚无法联系起来。总之，当时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还不清楚，在文化性质上仍若明若暗，在年代上则一概作为晚期的遗存，从而缩短了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历程，这就是过去的工作基础。

建国三十年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大规模的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新的发现丰富多彩，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同时还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碳-14的年代测定，陶器的化学组成、烧成温度和物理性能的分析，体质人类学的骨骼测量，农作物和家畜种类的鉴定等，都取得一系列成果。由于考古研究的空前发展，积累丰富的物质资料和科学论据，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从全国范围来讲，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已基本上填充地区或时代上的空白；这些考古发现，又在文化类型之间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许多新问题，显示它在世界考古学特别是亚洲考古学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为新石器文化的断代增添了新的证

据。目前发表的六百六十二个年代数据中，以新石器时代占绝对多数<sup>①</sup>。由于大批测定的结果，可以判断某些文化的绝对年代与考古发现的地层关系，基本是符合的。不过个别的数据也常会有一些的误差，特别是某些地区（如华南石灰岩地带）的误差更为显著，因而并不能全部作为断代的依据。本文引用的碳-14年代数据一律简称数据，其半衰期均按5730年计算，为了便于比较，凡属可能校正者，将树轮校正年代附在括弧内说明；一般采用达曼对照表，个别早期的则采取迈克尔对照表，由于某些数据已超出所有树轮校正表可能校正的最高年限，无法进行确切的校正，故暂缺。凡同一文化中具有多数断代数据者，仅举其早晚为例，必要的另外予以说明。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可能对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做出全面估价，只是就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理解谈一谈对若干问题的粗浅认识，以供进一步探讨的参考。

## 二 细石器传统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细石器的新发现，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作为一种新兴的工艺传统的产生和发展，代表不同的时代和分属于若干文化系统，决不是“细石器文化”一词所能概括的。

首先，在陕西大荔沙苑<sup>②</sup>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接着在河南许昌灵井<sup>③</sup>也有发现。这就证实中原地区不仅有典型的细石器，而且可能是农业产生以前的中石器遗存。细石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晚期，如山西朔县峙峪<sup>④</sup>和河南安阳小南海<sup>⑤</sup>都出现了细石器的雏形，从地层堆积和共生的动物化石，证明它们属于更新世晚期，特别是碳-14断代提供更确凿的证据，前者ZK109-0为公元前26950±220年；后者下层ZK654为公元前22150±500年，上层ZK665-0为公元前9050±500年。典型的细石器至少在旧石器晚期的末叶已经出现了，如山西沁水下川<sup>⑥</sup>和河北阳原虎头梁<sup>⑦</sup>都是代表性的遗存，它们一般缺少共生的动物化石，前者测定过四个数据，ZK417、358为公元前21950—14450年，后者未经测定，年代应约略相等。结合上述发现，大致可以推定典型的细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晚期的末叶，而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些早期遗存都位于华北一带，因而它可能是细石器传统的产生中心，并影响到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中原地区的细石器传统已告衰落，但在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都保留少量的细石器，甚至到青铜器时代的商代<sup>⑧</sup>，也还有个别的残余。这些迹象表明细石器在中原地区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

最近长江下游的南北两岸，如江苏连云港桃花涧<sup>(1)</sup>、东海大贤庄<sup>⑨</sup>、丹徒磨盘墩<sup>(2)</sup>和

(1) 据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所藏标本。张祖方等《江苏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二期，1980年）一文中曾引用，但作为旧石器。

(2) 据江苏省丹徒县文化馆所藏标本和作者于1980年9月调查时所采集的标本。

句容庙家山<sup>〔1〕</sup>都发现细石器，虽然地层情况不甚清楚，但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细石器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从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的北方草原地带，广泛分布着细石器的遗存，有的不与陶片共生，有的则包含不同种类的陶片，表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或文化系统。解放前只限于地面采集，往往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目前的发现则提供地层或时代上的证据。例如内蒙古海拉尔松山<sup>⑥</sup>和黑龙江呼玛十八站<sup>⑦</sup>等地，都发现单纯的细石器地层，出有较原始的船底形石核，可能属于中石器或新石器的早期遗存。以黑龙江密山新开流为代表的渔猎经济的遗址，细石器与纹饰复杂的篦纹、印纹陶器共存<sup>⑧</sup>。碳-14年代为公元前 $3480 \pm 90$ 年（校正： $4130 \pm 130$ 年）。辽宁沈阳新乐下层和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都发现聚落和房址，除细石器之外，还有磨制石器与篦纹陶共存，前者分布于辽宁的东南部，可称为新乐一期文化<sup>⑨</sup>；而后者则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可称为富河文化<sup>⑩</sup>。碳-14年代前者已测定四个数据，ZK667、267为公元前4670—4195年（校正：5295—4850年）；后者ZK188为公元前 $2785 \pm 110$ 年（校正： $3350 \pm 145$ 年）。此外，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则有彩陶、篦纹陶与细石器共存；辽东大长山岛则发现新乐一期文化层被叠压在变体的龙山文化遗存之下<sup>⑪</sup>，说明它们的文化面貌及其分布是相当复杂的。至于东北一带使用细石器的下限，可以晚到汉代甚至辽金时期。

沿长城直到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细石器遗存相当复杂，除伴存篦纹陶或绳纹陶以外，有些可能属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范畴，大都有细石器共存。新疆一带的细石器及其共存陶器，又另具特点，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并为一个文化系统。

西藏北部的申扎、双湖<sup>⑫</sup>和南部的聂拉木<sup>⑬</sup>等地，都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年代可能稍早。此外，云南元谋<sup>⑭</sup>和广东南海西樵山<sup>⑮</sup>也都发现不与陶片共生的细石器。

细石器传统的出现以华北为最早，不仅影响到东北亚洲的广大地区，甚至波及西北美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存在于不同系统的文化中，但它又不同于以欧洲、北非和西亚为中心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问题之一，值得今后深入探索。

### 三 中原早期遗存的新发现

一直作为缺环的早期新石器遗存，由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发现，开始有所突破<sup>⑯</sup>。前者已发现二十余处，主要分布在河南的中部，如郑州、新郑、尉氏、中牟、密

〔1〕 据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所藏标本。张祖方等的文章中也有引用，见本书第2页注〔1〕。



县、巩县、登封、长葛、鄢陵、郑县、项城和潢川等地；后者仅在河北武安发现两处，估计在冀南、豫北会有更广泛的分布。从文化面貌上看，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能属于两个系统，故分别命名。

裴李岗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新郑裴李岗<sup>①</sup>、密县裴沟<sup>②</sup>和长葛岗河等处。裴沟的房址为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有狭窄的斜坡阶梯式门道，室内周壁遗有柱洞。各遗址的灰坑均作圆形，一般小而浅。裴李岗还发现一座横穴式的残陶窑。墓葬共发现近二百座，集中葬埋形成氏族公共墓地，排列密集而有一定的规律，以单人葬为主，也出现个别的双人合葬。磁山文化的圆形带阶梯门道的浅坑，当属于房址。灰坑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的三种，其中长方形者有深达五米以上的，系贮藏用的窖穴。墓葬尚未发现，不过有许多成堆的器物，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虽不见人骨，也可能属于墓葬的遗迹<sup>③</sup>。上述遗址都达数万平方米，且有房址、窖穴、窑址和氏族公共墓地，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聚落。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富有农业经济的色彩，典型器物如带足石磨盘、棒状石磨棒、狭长扁薄的双弧刃石铲、带锯齿刃的石镰（磁山镰少且无锯齿刃）等，都属于农业工具，特别是在磁山的窖穴里还发现过成堆的腐朽粮食，已鉴定属于粟的残骸。裴李岗出土有栩栩如生的猪头陶塑，磁山则发现大量猪、狗等骨骼，反映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家畜。这些充分说明当时过着以农业为主要来源的经济生活，象磁山所发现的大量朴树籽、鱼骨和兽骨等，则表示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比例。

在陶器上具有一定的原始性，都是手制，胎壁厚薄不匀，烧成温度一般较高，裴李岗为900—960℃，磁山为700—930℃，裴李岗还发现过与仰韶文化相近的横穴窑，表明在制陶工艺上已有相当发达的基础。尽管常见的器形有所不同，但两种文化的双耳壶、大口深腹罐，毕竟属于同类器物，特别是象圆底钵、三足钵、假圈足碗和鼎等器形都基本一致。甚至中原地区罕见的篦点纹，两者也都有发现。不过象磁山那种以孟和支架为代表的陶器群，全然不见于裴李岗；同时磁山陶器上所习见的绳纹和个别彩陶，在裴李岗则绝无存在。至于磁山陶器的纹饰种类和比例，较裴李岗大为增多，器形种类也更加复杂化，究竟是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还是具有相对的发展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工作。

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还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显得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如房址、窑址和墓葬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作为二者的典型器物，象圆底钵、三足钵、大口深腹罐、假圈足碗、长颈瓶、双耳壶和鼎等，均见于仰韶文化，而绳纹和彩陶等纹饰在仰韶文化中更为普遍。此外，石磨盘和石铲在仰韶文化中仍有残余，不过在形制上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迹象充分表明它们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这就更加延长中原文化在发展上的连续性。至于篦点纹的出现，也是目前最早的遗存，那么东北和东南沿海的同类遗存，当同中原地区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碳-14断代为上述两个文化的年代提供一系列的数据，不过某些标本由于木炭量少，合并不同的出土单位，并用本底苯填充，不排除有较大误差的可能性。如裴李岗的三个数据：ZK754、753、571为公元前5495—5195年；与裴李岗相同的莪沟北岗遗址也测定过四个数据（WB78-31、38、39、ZK580），为公元前5340—5025年，其它如巩县铁生沟、淇县花窝和密县马良沟遗址的三个数据（ZK748、755、747）为公元前5315—4905年，由此可证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当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至于个别较早的数据或可摒弃不用。磁山遗址也测定过三个数据（ZK439、440、BK78029），为公元前5405—5110年，则它们的年代也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当然现有的数据仍不排除有一定误差的可能性，不过已充分显示裴李岗和磁山可能是同时并存的两种文化。由于两者的地域分布不同，文化面貌互有差异，但年代却大体接近，这就为我们划分为两种文化提供有力的旁证。这无疑是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已知的最早遗存，但它们同中石器之间的缺环，仍有待继续探索。

此外，同上述两个文化相类似的遗存，在陕西也有发现，如所谓“老官台文化”<sup>④</sup>，其陶器是大口深腹罐、假圈足碗、圆底钵和三足钵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钵口已施彩，而陶质、器形和纹饰却与宝鸡北首岭下层一致，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范畴。至于最近发现的渭南白庙遗址<sup>〔1〕</sup>，其陶器以绳纹的三足钵、罐为主，钵口上饰有红色的彩带，虽接近于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而具有更原始的性质，碳-14年代为公元前5010±120年，可能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不过秦岭以南的西乡李家村遗址则另具特点<sup>⑤</sup>，虽同仰韶文化早期有所类似，当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年代也可能稍迟。

山东滕县发现的北辛类型<sup>⑥</sup>，被叠压在大汶口文化之下，同样或相似类型的遗址还包括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sup>⑦</sup>、连云港二涧村<sup>⑧</sup>和淮安青莲岗<sup>⑨</sup>等遗址，可能属于青莲岗文化的范畴<sup>〔2〕</sup>，它分布于淮河到鲁南一带。陶器的器形比较简单，有釜、鼎、罐、钵和支架等，有的遗址还有角式把手、红顶钵和纹饰简单的彩陶，也有用附加泥条组成并排的竖线纹。据北辛下层的七个数据，ZK632、640为公元前4775—3695年（校正：5395—4350年）。值得指出的是，北辛下层的石磨盘和青莲岗的彩陶、支架等，似乎与磁山文化或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至于青莲岗的腰檐釜和角式把手，又可能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有关。从地层关系、年代以及陶器的发展来看，青莲岗文化应是大汶口文化的先驱。

〔1〕作者于1980年5月调查时，在一个被破坏的灰坑里采到大量陶片，并清理出兽骨作为碳-14的测定标本。

〔2〕关于青莲岗文化的涵义及其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可参照《文物集刊——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所收的有关论文。作者所提出的和过去的各种看法不同，还需要继续讨论。

#### 四 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变体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分布较广，而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种新石器遗存。它的地理分布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豫、晋、陕、冀、陇东、宁夏、内蒙古南部和鄂西北一带。碳-14年代已测定四十三个数据，其中ZK519、115为公元前4515—2460年（校正：公元前5150—2960年），表明仰韶文化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农业经济相当发达，除粟类作物外，还出现蔬菜的种植。定居生活相当稳固，形成大规模的聚落遗址，从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象陕西西安半坡<sup>①</sup>和临潼姜寨<sup>②</sup>等遗址的发掘，对当时的村落布局和经济生活等，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

仰韶文化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其显著特征，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器形种类和纹饰变化等方面表现较大的差异，因而提出划分类型的概念。尽管在类型的划分标准和如何命名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对于它们之间的不同文化相以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遗存，暂可分为北首岭<sup>③</sup>、半坡、庙底沟<sup>④</sup>和西王村<sup>⑤</sup>四个类型；在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即洛阳以东的豫中地区，可划分为庙底沟和大河村<sup>⑥</sup>类型；在沿太行山麓的华北平原，即豫北、冀南一带，可划分为后岗、大司空村类型<sup>⑦</sup>。当然以上的划分并不代表其发展的全过程，有些缺环仍有待于填补，不过结合地层关系、文化面貌和碳-14断代，基本上可以肯定各类型之间的相对序列及其年代之间的对比。

黄河上游的遗存，与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差异，过去称为甘肃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以资区别<sup>⑧</sup>。大体上可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代表它们的发展序列。由地层关系上证实，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早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而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石岭下类型，从陶器的器形和彩陶纹饰上，表现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碳-14数据也提供有力的证明：如石岭下类型ZK186为公元前3190±160年（校正：3815±175年）；马家窑类型六个数据中，ZK523、522为公元前2725—2280年（校正：3280—2740年）；半山类型六个数据中，ZK407、406为公元前2230—1970年（校正：2675—2355年）；马厂类型八个数据中，ZK21、346为公元前2185—1715年（校正：2625—2050年），表明它们均迟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事实上石岭下类型具有过渡的性质，从陶器器形和彩陶特征来看，似归入马家窑文化为宜。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sup>⑨</sup>，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的部分地区，并发展到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一带。在发展上，也大体经历两千来年的时间，在二十七个碳-14数据中，ZK90、479为公元前3835—2240年（校正：4494—2690年），不过还有五个数据（ZK317、362—0、391—0、363—0、361—0）年代偏晚，为公元前1960—1610年（校正：

2350—1905年），不象是测定上的误差，可能由于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分界上有所混淆，它的下限至少以早于公元前二千年为是。大汶口文化具有本身的特点，并且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先驱，但它的早期却不可否认受到仰韶文化的浓厚影响，如盆、钵、豆、鼎等陶器，特别是三角涡纹和圆点纹等彩陶纹饰，都和仰韶文化相接近；同时河南郑州大河村<sup>⑧</sup>和鄢陵故城<sup>〔1〕</sup>等仰韶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类似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物的背壶，可能说明在两者的接触地带而互有影响。至于大汶口文化晚期，<sup>2</sup>已深入到豫中地区，如平顶山市寺岗<sup>⑨</sup>、偃师滑城<sup>⑩</sup>都有所发现。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则以带划纹的大口深腹罐为主，从器形上与沈阳新乐一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相近似，也有彩陶以及鼎、鬻、盃等器形与大汶口文化相一致<sup>⑪</sup>，可能属于一种地方性的变体。此外，大汶口文化的人骨具有与仰韶文化相似的特征，至少两者的关系比较密切。至于大汶口文化人类头骨的人工变形与敲牙，代表一种特殊的习俗，并不能把它作为接近坡里尼西人种组群的证据<sup>⑫</sup>。

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有更接近的性质，如泥质红陶的碗、钵、豆，特别是红顶碗和彩陶尤为一致，敖汉旗四棱山发现的横穴陶窑，也与仰韶文化具有更大的共性<sup>⑬</sup>。不过象加饰弧线形篦纹的粗陶罐，则不见于仰韶文化，甚至这种篦纹还施于泥质红陶之上，并有大量细石器共存。过去把它作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的提法，不见得妥当。最近在河北廊坊也发现了同类的遗址<sup>〔2〕</sup>，可能是它的分布南限，这就表明红山文化可能是与仰韶文化接壤的一个地方性的变体。

由东北到内蒙沿长城一带，有许多遗址具有仰韶文化的特点，往往与细石器或其它类型的陶器共存，由于都是地面采集，无从判断它们的共存关系，不过从遗物的性质上观察，大部分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有些则可能是与红山文化相类似的地方性变体。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龙山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显示中原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有关的遗存中，以仰韶文化的出现为最早，而周围的遗存则属于它的支脉或地方性变体，或者是接受它的影响，这反映出仰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五 龙山文化的再认识

继仰韶文化而兴起的龙山文化，地理分布益加广阔，文化面貌的地域性，也表现得更加突出。首先在陶器上已变成以灰陶为主，器形和纹饰均较仰韶文化有巨大的变化，它的晚期还出现轮制，表明制陶工艺的进一步发展。过去把龙山文化作为单一来源或由

〔1〕据河南省博物馆藏品。

〔2〕据河北省廊坊地区文化局的发掘资料。

东向西发展的提法，已经无法成立了。为了处理方便，曾分别冠以省名或另外给予文化名称以资区别，如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或后岗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还发现早期龙山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通过大批资料的发现，取得了下列的认识：

庙底沟二期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目前的分布仅限于豫、晋、陕交界地区。陶器以灰陶为主，但不见黑陶，很多器形承袭自仰韶文化，尤以大口深腹带纹罐、鼎、小口尖底瓶、菱形带纹彩陶罐和红衣小陶杯最为突出，代表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属于早期龙山文化<sup>⑧</sup>。已测定的两个数据，ZK682、111为公元前2340—2310年（校正：2875—2780年），也可进一步得到确定。

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河南之外，尚包括晋南和冀南的部分地区。陶器中的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纹饰继承自庙底沟二期文化，轮制和黑陶占相当的比例，器形的特点是，鬲多而鬻少，有鬻少甗，鼎也不多见，以敛口深腹小平底罐为主，也有单耳或双耳的浅腹杯等。在二十五个碳-14数据中，ZK823、771为公元前2185—1800年（校正：2625—2145年）。不过两个数据疑有误差，如ZK359为公元前2450±160年（校正：2950±195年），显得偏早；ZK349为公元前1690±100年（校正：2005±120年），又显得偏晚。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两者联结得如此紧密，以致在划分界限上可能发生混淆的现象。陶器以轮制为主，多典型的黑陶，陶面的修饰主要是素面和磨光。在器形上鬻多鬲少（或不见鬲），有甗无鬻，鼎类颇多，罐类以矮肥的形式为主，同河南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差异。它的分布以山东为主，河南、河北、江苏的部分地区以及辽东半岛一带也有所分布。在四个碳-14数据中，其ZK390-0、364-0为公元前2010—1530年（校正：2405—1810年），表明它的年代一般较迟，当中原地区已进入早商之后，山东龙山文化可能还延续了一个时期。黑陶上的云雷纹<sup>④</sup>和玉铙上的兽面纹<sup>⑤</sup>，或许表示它与中原的青铜文明有所接触。从文化相上来看，由东而西逐渐变化，终于过渡到河南龙山文化，以致找不出绝对分明的界限。至于辽东半岛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旅顺老铁山积石墓、郭家村上层、长海上马石中层出有蛋壳陶、黑陶杯和环足鼎等酷似山东龙山文化，其它器物则差异较大，可能属于地方性的变体；另外如双砮子一期文化，虽以黑陶为主，但不见轮制，在烧好的黑陶上绘以红、黄、白色的纹饰，则为山东龙山文化所不见。据碳-14断代，ZK78为公元前2060±95年（校正：2465±145年）。双砮子二期文化则具有相似的性质，以轮制黑陶为主，不见彩绘，属于一期文化的延续。以上两期可能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变体。双砮子三期文化则以灰褐陶为最多，手制又占优势。虽然和二期文化有继承关系，但表现较大的变化，其碳-14断代，ZK79为公元前1170±90年（校正：1360±145年），当与青铜短剑墓有一定的联系。过去误把

这个数据作为双碇子二期文化，应予更正。

陕西龙山文化可能是继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轮制的比例很少，纹饰以绳纹为主，不见方格纹，素面磨光也不多见。器形以鬲为最多，鬻、盃比较少见，鼎也极少，鬲、罐与河南龙山近似，而双耳（或三耳）罐则接近齐家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关中一带，陕北和晋南也都有遗存。ZK673为公元前1810±90年（校正：2155±110年，约略与河南龙山文化相等。值得指出的是，它同齐家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在渭河流域，它的下游是以灰陶为主的陕西龙山文化，溯流而上则有所变化，如岐山双庵遗址的陶器器形属于陕西龙山文化的范畴，然而陶质已全部变为红陶与齐家文化相类似<sup>〔1〕</sup>，这就证实以红陶为主的齐家文化应起源于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地向西发展，也承袭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如彩陶等），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尽管齐家文化已另行命名，从它的实质来看，仍应属于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遗址普遍出现了红铜器，显然年代较迟，如七个碳-14数据中，ZK410、347为公元前2180—1620年（校正：2615—1910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青铜镜<sup>⑥</sup>，其形制纹饰与殷墟妇好墓所发现者相近似，这就证实齐家文化的下限，也可能晚到商代后期。

晋北一带类似龙山文化的遗存，文化面貌还不怎样清楚，显然也属于一种地方性的变体，尚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上继仰韶文化，下承二里头文化，表明它是从氏族公社过渡到阶级国家的一个转折点。从一些主要的文化因素来看，往往随着地域分布而有所不同，例如轮制陶器愈东愈多，而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则愈西愈多，到了陕西境内篮纹减少而不再见方格纹，甚至随着愈向西发展，就由灰陶而变成红陶了。至于陶器的器形，也因地域不同而有较大的变化。在上述渐变过程中，往往难以划出明确的界限，尽管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来源，由于彼此接壤而互相影响，就必然出现较大的一致性。目前的类型划分，只不过勾画出大体轮廓；特别是历史上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可能与龙山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它们的源流如何？都是考古学上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之一。

## 六 江汉地区的诸遗存

江汉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大体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四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它们有着不同的地域分布，并有交叠的地层关系，而在文化面貌上又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豫东南的汉水流域，具有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特点。

〔1〕据西安半坡博物馆发掘资料。

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层的红烧土中印有稻谷痕迹<sup>⑧</sup>，这表明秦岭以南的仰韶文化，已适应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开始种植稻米，而不同于干旱的黄土地带那样种植粟类作物。

大溪文化<sup>⑨</sup>主要分布于川鄂三峡地区、鄂西南和湘北一带。有的遗址叠压在屈家岭文化之下，揭示了两者的相对关系。打制石器较多，有形制巨大的磨制石斧。陶器中以红陶为主，用稻壳作屨和料，也有灰、黑陶和少量白陶，均系手制。器形中圈足器较发达，有鼎、豆、簋、杯、碗、罐和器座等，以曲腹杯和筒形瓶为典型代表，并有彩陶和朱绘黑陶，具有特殊的文化特征，但不可否认它与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如彩陶纹饰中的圆点、弧线、三角弧纹与庙底沟类型相近似，同时河南浙川下王岗的仰韶文化层中也出土过类似大溪文化所特有的彩陶筒形瓶和圈足器，而宜昌红花套大溪文化层中又发现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的小口尖底瓶残片，则它们之间无疑有着密切的文化影响。大溪文化的年代应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据四个数据（ZK687、352）其年代为公元前3825—2405年（校正：4485—2895年）。至于ZK683为公元前5605±130年，年代偏早，疑有误差。

屈家岭文化<sup>⑩</sup>主要分布于鄂北及豫西南一带，在鄂西南与湘北则与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相重合。屈家岭文化的早期以黑陶为主，晚期以灰陶为最多，依然是手制的。器形中三足器和圈足器相当发达，有鼎、豆、杯、罐和器盖等，其中的曲腹杯、高圈足杯和朱绘黑陶都承袭了大溪文化，而以蛋壳陶和彩陶纺轮为最典型。蛋壳彩陶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红衣小陶杯相似<sup>⑪</sup>；河南禹县谷水河也发现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的高圈足杯<sup>⑫</sup>，可见屈家岭文化当与中原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在五个碳-14数据中，ZK430、124为公元前2550—2195年（校正：3070—2635年）。

江汉地区的龙山文化，与中原地区有较大的区别，或可暂名之为湖北龙山文化（或青龙泉三期文化）<sup>⑬</sup>。陶器的特征是手制，以篮纹灰陶为最多，红陶、黑陶较少，也有少量彩陶，器形中有鼎、鬲、鬻等，但缺少鬲、甗，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可视为龙山文化的区域性变体。碳-14断代，ZK431为公元前2030±105年（公元前2430±150年）。

江汉地区和三峡地区，仰韶文化之外的三种文化，可能有继承关系，并同中原地区相互交流。不过这里的陶器至多是慢轮修整，轮制始终没有出现；大溪文化陶器的烧成温度偏低，如大溪遗址为750—810℃，湖北宜昌红花套为600—700℃，湖南澧县梦溪为88℃，屈家岭文化的陶器稍有提高，如湖北隕县青龙泉也不过是900℃。由此可见，它们的制陶工艺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这一带的农业经济都以稻作为主，仰韶文化也不例外，这与附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是分不开的。

## 七 长江下游的文化序列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可能还包括其它类型的文化遗存。

河姆渡文化虽仅发现一个地点<sup>〔1〕</sup>，估计杭州湾及其附近当有广泛分布。它叠压在马家浜文化之下，陶器比较原始，手制，绝大部分为夹炭黑陶，陶质疏松，器壁粗厚，造型也不规整，火候稍低，800—930℃，一般在850℃左右。夹炭黑陶是以经过燃烧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为屨和料，具有显著的特点。器表除磨光外，往往有繁密的绳纹和划纹。器形以釜、罐为最多，而以釜和支座最具有代表性。仅发现三片彩陶，是在印绳纹的夹炭黑陶上施一层较厚的灰白泥，然后磨光绘以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这种彩陶比较特殊，但可能与中原仰韶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尽管陶器比较原始，但磨制石器发达，骨、木器等相当进步，如带雕纹的骨器、骨耜，复杂的木质工具以及带榫卯的木构干栏式建筑，都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成堆稻壳的发现，成为亚洲最古老的稻作遗存。碳-14的二十一个数据中，BK75057、78117为公元前4360—3320年（校正：5005—3955年）。从年代上无疑是较早的，不过至多和仰韶文化早期相当或略晚，因而不能排斥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关系。

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被分为马家浜<sup>⑤</sup>和崧泽<sup>⑥</sup>两期，也有认为应包括南京北阴阳营的下层墓葬<sup>⑦</sup>在内，三者具有不同的文化面貌，前二者或可作为马家浜文化的早晚阶段，后者另当别论。以马家浜为代表的早期阶段，可能承袭自河姆渡文化，制陶工艺尚保持一定的原始性，已分化为砂陶与泥质陶两种，以红陶为主，也有部分灰陶和少量黑陶。其中以表红胎灰的泥质陶最具特色，这由于在烧窑过程中，仅陶面氧化呈薄层的红色，与陶衣无关。在江苏常州圩墩<sup>⑧</sup>和吴县草鞋山<sup>⑨</sup>都发现了个别彩陶。基本上是手制，部分器物经慢轮修整。陶器火候稍低，在800—870℃之间。开始出现鼎、豆、鬲、盂等器形，前二者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联系，而两个袋足的异形鬲和平底带流盂，可能属于初兴的原始形制，对后来广泛分布的同类器形有着深远影响。晚期以崧泽中层为代表，陶质与早期相似，开始出现轮制。陶器火候也较低，为760—810℃之间。二十一个数据，ZK201、437-0为公元前3670—2685年（校正：4325—3255年），其中ZK46为公元前4090±100年（校正：4750±125年），年代偏早，暂可存疑。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相当，不能排除它们之间的交流与影

〔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按两个报告的论点略有不同，前者认为遗址的第三、四层属于河姆渡文化，而第一、二层与崧泽、马家浜相当；后者则主张“四个文化层当是河姆渡的四期文化，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暂从前者的说法。



响，如鼎、豆、鬻、盃以及彩陶等，便是明显的例证。其早晚阶段的文化性质，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将来或可分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以相区别。

以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为代表的遗存，位于江淮之间，可能另有来源。尽管陶器的质料、器形同马家浜文化有相似之处，但这里多彩陶和角形把手为马家浜文化所不见。这可能由于太湖流域和江淮之间的地理接壤，以及文化上的交流影响所造成的。因之，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不宜归入马家浜文化，如果将江淮之间作为一个文化区，或可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

良渚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继续。石制工具有了显著发展，磨制精致，种类复杂。制陶工艺也显著提高，轮制普遍出现。陶质以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表皮的颜色容易脱落。最薄的胎壁1.3—2毫米，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近似。烧成温度已提高达940°C。器形以鼎、豆、杯、鬻、盃为最常见，也发现一些彩陶和朱绘黑陶。碳-14数据共六个，其ZK49、254为公元前2750—1890年（校正：3310—2250年）。至于ZK433为公元前3210±230年（校正：3835±240年），年代偏早，可摒弃不用。它的开始稍早，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的阶段相当，特别是从文化特征上，与山东龙山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

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都有丰富的稻谷发现，证实这一带也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不过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农作物，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甜瓜子、花生、芝麻、蚕豆和丝麻织品等<sup>⑧</sup>，曾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据实物观察，花生虽已炭化，仅从外形观察，似乎难以肯定，甜瓜子、芝麻和蚕豆均未炭化，皮色犹新，很难相信其为古老的遗存；至于残绢片尚未炭化，苧麻布虽已炭化，仍保有一定的韧性。我们知道该遗址的文化层低于水面，动、植纤维易于保存，但也容易炭化。那么埋藏在地下达四千余年之久，某些植物种子还皮色犹新，某些纺织品还未完全炭化或仍有一定的韧性，未免是不可理解的。因之，上述遗存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仍有争议，不过发掘者认为它们的层位和时代都是可信的<sup>⑨</sup>。

## 八 东南和西南的遗存及有关问题

东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基本上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遗存呈现着一定的地域性，而晚期遗存则与长江、黄河流域表现较大的一致性，当然也具有它们自己的特点。西南一带的资料比较零星，大都是晚期遗存，其发展阶段还不怎样清楚。

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如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一带。遗址的种类包括洞穴、贝丘和台地三种，它们的出现主要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形态或其它因素所决定，并不意味着可以作为文化类型或时代先后的代表<sup>⑩</sup>。在如此广阔地区之内，可能分布着不同的文化系统，并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限于